

軍医鈴木英夫が見た日中戦争と南昌日本留学生の悲劇

(軍医鈴木英夫目睹の中日戦争と南昌中国留日学生の悲劇)

小林 一 美
劉 芳 訳

日本文概要

鈴木英夫は、1912年、神奈川県座間市（旧座間村）の名家に生まれ、旧制成城高校（理科）に進学し、著名な歌人・北原白秋を知る。少年時代から詩歌に親しむ。31年、千葉医科大学（現千葉大学医学部）に進学し、内科小児科卒。在学中、演劇部に所属し、多くの書物を読み、文学仲間を知る。1936年卒業と同時に軍医候補とされ、37年・軍医中尉として徴兵され、同年8月、第101師団（東京・編成）の衛生兵として上海戦線へ投入された。死者9150名、負傷者3万1257名の死傷者を出した上海戦線で検屍を行い、傷病兵の治療にあたった。以後、上海、杭州、上海を経て、翌38年夏、南京を経由して廬山周辺で戦い、ついで南昌攻略作戦に投入された。38年冬は江西省の修水县で越冬し、翌39年春に南昌市が陥落すると同時に同市内に入った。

鈴木が南昌に入った3月28日、30万余の市民は避難して人ひとり見ず、南昌はほぼ無人の市街と化していた。家という家はすべて表門も裏門も煉瓦と漆喰でかたく塗り固められ、長く人の出入りした様子がなかった。その後、人口は徐々に回復した。市内に駐屯していた時、宿泊していた家の隣の張家で南昌の一女学生が記した、1934年前半期（1月～7月）の日記帳一冊と張家・謝家の書簡の束を見つけ、この両家から多くの日本留學生が出たことを知った。この家にある日本の書籍、日本語ノート等々の多さにも驚嘆した。書簡と日記を読むうちに、彼等・彼女らへの同情と共感と懐かしさで一杯になった。

以後、南昌での軍医勤務の3か月の間、仕事以外の総ての時間を、これら日記、書簡の解説と翻訳に費やした。この年の8月、鈴木は病気に罹り、日本に帰国せよとの命令を受けたが、日記と書簡は全部を解説できていなかった。上記の日記と書簡、それに自分の陣中日記をこっそりと将校行李の底に隠して帰国船に乗り、同年暮れに日本に持ち帰った。彼は帰国後の2年間に、日本に持ち帰った少女の日記、元留學生たちの書簡を元に3冊の小説と自己の出征と戦地での体験記を書いた。最初の『罌れし花』女子文苑社、引きつづいて小説『遠東の人』3部作（『趙君瑛の日記』女子文苑社、『陳一族の手紙』・『ある中尉の手記』大同印書館）、合計4冊の著書は、昭和16、17、18年の3年間に連続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著作には、出征するまでの父とのやり取り、過酷な戦場の状況、南昌の張家・謝家の両家から日本に留学した中国人青年たちの憂国の至情、帰国すべきか、それとも日本で学問研究を続行すべきかという煩悶、及び彼らが最後に迎えた惨酷な運命等々が、生々しく物語風に描かれている。

鈴木軍医は、すでに両親なく、また医者として独立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の若き20歳代の一軍医が、強い検閲と出版統制下にあった戦時中に、4冊もの著書を書いて出版することは大きな困難と強い決意があったものと想像される。いつ再度の出征命令を受け、いつどこで戦死するかも分からなかった。実際、中国戦線から帰国して3年目に、再び黒竜江省の孫呉へ、その後北海道に移動になり、アッツ島に送られる予定が中止になり除隊。すぐ又東京湾沖合にある新島守備隊に軍医として3度目の召集をうけ、ここで敗戦を迎えた。

彼は敗戦後も、中国人留學生たちの苦悩、悲惨な運命、戦争の惨禍を後世に伝えることに勤めた。帰国

時に持ち帰った張・謝両家にあった書簡の完全な日本語訳を行い、『趙君瑛の日記』（趙君瑛は仮名。1963年刊、本名は「趙中瑛」）として新たに出版した。また、自分の戦陣日記をそのまま『戦陣秘帖』（1963年刊）として刊行した。1994年には中国留学生を自宅に招いたり、北京大学に張京先（元奈良女高師の留学生）を訪ねたりした。また一方、彼は北原白秋の衣鉢を継ぐ歌人としても活躍し、数冊の歌集の他『北原白秋の思想』（短歌新聞社）を上梓した。戦前、日本に留学していた中国青年達が、その日本の戦争によって悲劇的な運命を迎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日中戦争の悲惨、悲劇を伝えた鈴木の仕事、及び彼の生涯は多くの日本人、中国人に知られる価値があると思う。

中文概要

鈴木英夫 1912 年生于神奈川县座间市（原座间村）的名门之家，升入原旧制成城高等学校（理科）学习，与著名歌人北原白秋相识。自少年时代开始就爱好诗歌。1931 年考入千叶医科大学（现在的千叶大学医学部），毕业于内科儿科专业。大学时代参加演剧部的课外活动，饱览群书也结识了很多文学朋友。1936 年毕业即成为预备军医，1937 年作为军医中尉被征去当兵，同年八月以第 101 师团（东京・编成）的卫生兵身份加入上海战线。上海战线中死去人数为 9150 人，负伤人数为 3 万 1257 人，铃木负责尸检和伤病治疗的工作。之后，经上海，杭州，再经上海，于 1938 年夏天途经南京在庐山附近参加战斗，最后加入南昌攻略作战。1938 年冬天在江西省修水县过冬，第二年即 1939 年春天南昌市陷落同时进入南昌市区内。

铃木进入南昌的时间是 3 月 28 日，30 余万市民早已避难不见踪影，南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说是家，几乎所有的大门后门都用瓦和灰泥固上，好像已经长时间没有人出入的样子。之后，人口慢慢有所回升。在市内驻军时，在住民家的邻居家中发现一本中学女生记述的 1934 年前半期（1 月～7 月）的日记以及张家，谢家的书信一束，由此知道这两家出了很多留日学生。还吃惊于这家存有大量日本书籍，日语笔记等。读着书简和日记，不由得对他们，她们生出许多同情，共鸣和伤怀。

此后，在南昌做军医的三个月时间里，除去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铃木都专注于书简的解读和翻译。这一年 8 月，铃木因病接受了让他回日本的归国命令，但是日记和书简没能全部解读完。于是将上面说的日记和书简，还有自己的战场日记偷偷藏在将校行李的底部乘上归国的船只，于同年秋全部带回日本。

他回国后的两年时间里，以带回日本的少女日记，原留学生们的书简为原型创作了三本小说以及出征和战地中自身经历的传记。最初的创作是《鲷花》，接着又写出《远东的人》三部曲（《赵君瑛日记》女子文苑社，《陈氏一族的书信》·《某中尉的手记》大同印书馆）共四本著作，在昭和 16 年（1941 年），17 年，18 年连续三年间出版。这些著作中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在出征前与父亲之间的往来，残酷的战场情况，南昌的张・谢两家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年轻人的忧国至情：是应该回国还是应该在日本继续学问研究的烦恼以及他们最后面临的残酷命运等。

铃木军医当时已经父母双亡，也没有做医生开诊所。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个年轻的只有二十几岁的军医在战时残酷的审查和出版统一管理的条件下，能够创作出四部著作并最终出版是战胜了很大的困难并有着难以想象的坚强决心的。不知道何时会再接受出征命令，也不知道何时在哪里会战死。实际上，从中国战线回国后的第三年，被派到黑龙江省孙吴县，后又转至北海道，因为送到阿图岛的计划取消退伍。随后又接到第三次召集令，到东京湾海面的新岛守备队做军医，在此迎来战败。

他在战败后也一直致力于向世人诉说中国留学生们的苦恼，悲惨的命运和战争惨祸。将归国时带回的张，谢两家的书简全部译成日语以《赵君瑛日记》（赵君瑛是假名字。1963 年刊出，本名可能是“赵中瑛”）为书名重新出版。还将自己的战场日记直接以《战场密帖》（湘東文庫 1955 年刊）之名出版。1994 年招待中国留学生来自己家中，到北京大学拜访了张京先（原奈良女高师的留学生）。另一方面，他又继承北原白秋的衣钵作为歌人开展活动，除出版数册歌集之外还著作《北原白秋的思想》（短歌新闻社，1985）一书。

战前，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们因为那场原自日本的战争面临悲剧性的命运，铃木以诉说中日战争的悲惨，悲剧为已任，以及他的整个生涯都有让更多日本人和中国人知道的价值。

1 1939 年 3 月铃木英夫作为军医进驻南昌

铃木自 1939 年春至夏住宿在南昌一户宅邸。这家人有很多留日学生用过的日语书籍。某日听说隔壁家也有很多留日学生就进到那家去看看。不知道是日本兵还是别的谁已经把用瓦密封起来的门凿了一个洞，到处都留着被翻过的痕迹。渴望书籍的铃木爬到这家屋顶下的阁楼里看到很多包括日文及其他书，笔记本，还翻起了一个叫赵中瑛（后被铃木在日本用“赵君瑛”一名进行介绍并创作多部作品）的女学生的一册日记。铃木因毕业于医学系对德语和英语知道得很多，但不能用中文十分顺畅地阅读。好在他受到一些在旧制中学（现在的高中）教授国语，汉文的父亲的影响，再加之小学，中学时代学习汉文的底子使得他可以猜着读懂相当多部分的内容。

这家存放着有着十分亲密的亲戚关系的张，谢两家的书简。铃木既不知道在华中有南昌这样一个城市也不了解这里的人。在得知有很多留日学生出自这个内陆城市并且他们就学的都是在日本十分有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奈良女子大学，战前是日本女孩子向往的最高学府，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齐名的两大名校之一）等处后十分感怀。进而又得知 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中，在上海游行时被打死的复旦大学的学生，1937 年 8 月在上海郊外上空与日本战斗机激战，18 岁就战死的杭州航空学校的学生等人均出自这家（五卅惨案之后的内容也许是铃木的创作）。

铃木虽然已经有近两年派到中国做士兵的经历，却第一次在这里读到他们和她们的日记，信件，作为同样在日本学习的“同学”，同样作为品尝苦乐的“人”以及同样为现实所苦恼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他们并与他们的心情产生共鸣。再加上作为加害者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他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们的命运与不幸，强烈地感受到有责任把他们的苦境和心情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约是两年前的 1937 年 9 月开始，铃木以中尉军医的身份从军于“第一百零一师团”，参加上海大场镇的攻防战之后辗转杭州，上海，于第二年即 1938 年夏加入长江中流的庐山一带的激战。1938 年冬在修水县越冬，翌年春参加江西省南昌攻略战。这期间，从上海开始便目睹仅穿着随身衣服逃跑的民众受苦受难的情形，有时看到被日本军抓到处刑的场面禁不住背过脸去。可是只看战败国民众普通的惨状是无法体会如同自己朋友，自己同胞受难般的感受的。但是铃木通过留日学生书简，日记第一次发现具体的“吐露真情的中国人”，“具有同样知识和感情的人”。或许他透过文字记录与中国人命运似的邂逅才意识到人为何物，自己又是什么人。

最初精神性的契机则是由于犯下一桩原罪。铃木偷看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女学生非常私人性质的书简和日记。并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无论如何都想把那些从阁楼中带出来阅读的诱惑。他禁不住要阅读并真正意义上地去解读，完完全全地去翻译。之后在南昌的三个月时间里，除去工作时间几乎把心全部放在了翻译这些内容上。特别吸引铃木的是赵君瑛（这是假名字，真名是赵中瑛）这个少女的日记。可是，翻译只进行到三分之二也就是秋天铃木因病接到回国命令之前。铃木将这些书简，日记隐藏在将校行李的底部，途经九江，上海终于带回日本。铃木对当时的心情写下这样的内容。

（在南昌张家）开始在这家找出两三本日本的书时，我还只是充满亲切眷恋之情。我仿佛感受到的是意外地在敌人深处遇见友人般的喜悦。但随着我深入发现去日本某校的这家的女孩子，她哥哥和之后与之结婚的表兄，妹妹之间的多封往来书信，笔记，还有这家小女儿的朋友一个女学生的日记后，我的心情彻底发生了变化。……那当中浮现出的是十分清晰的中国知识阶层的青年男女鲜明的人物形象。……偷窥还依然活着的人们的隐私信件甚至还有一个可爱少女的日记，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罪恶。但我还是那样做了。而且要把这些展示在更多人面前。一想到这种毫无怜悯之心的罪恶，我便痛苦不堪。（即使如此还是要把这些书简，日记带回日本并出版——小林记）通过读这些，我们日本人中的一些人或许能够知道并理解中国随之产生一种爱吧。（《赵君瑛日记》昭和 16 年版，序章）

2 中日战争期间出版的《赵君瑛日记》及其他四册书

铃木从战地返回日本的两年之后（1942年），再度因为征兵被派到北朝鲜和满洲的边境地带，与在沿海州驻军的苏联士兵相对峙的战地孙吴那里做军医，这次期间较为短暂。昭和19年（1944年）接受第三次召集，被派到东京湾海面的新岛守备队任军医。铃木的青春几乎就是从一战地到另一战地如走钢丝般充满危险。即便如此，从昭和16年至18年在日本的一年半之中他还是创作完成了有关出征前后状况以及张，谢两家人为主人公的三本小说。

铃木先是完成《衄花》，之后又一气呵成地创作了《远东的人》三部曲（《赵君瑛日记》，《陈氏一族的书信》，《某中尉手记》）。铃木开始想用真名写作品中的人物，并想创作成报告文学风格的作品。但最终还是听从朋友的劝告，如果用真名的话会给出现在你作品中的中国人带来麻烦的。因此主要人物都以假名字出现，但是“我要写的都是事实。故事的脉络是虚构的，除此之外都是有确实根据的事实”（《赵君瑛日记》前言）。

铃木回国之后随即从1939年11月开始住进大阪的医院几个月时间。据说从这时开始至1940年春天之前完成了全部翻译。这期间对资料中出现的张家姑娘张佩芬（姐姐，入学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张佩芳（妹妹，入学奈良女子高等师范——这个妹妹实际上没来日本。铃木自己创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佩芬的丈夫谢家的谢光蕖（留日苦学十年毕业于大阪帝国大学。铃木的著作中用的是假名字），张家的张定钊（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理学专业。铃木著作中用的是假名字）等有了详细地了解。又去奈良和京都拜访友人又找相关人士咨询。也读了很多写中国当时状况的书。写作过程中，仿佛是他们她们依附在铃木身上“随意地讲起来”。据说这是灵魂“依附现象”。

铃木从大阪的医院出院后，暂时回到故乡后又回到母校千叶医科大学。在那儿，他仿佛是什么的灵魂附体一样的兴奋地写完小说《赵君瑛日记》。对此他这样写道：

出现一种兴奋的状态是在写小说《赵君瑛日记》的时候。那时，我在千叶某医院的院长官邸自己做饭。花了很长时间准备，但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写完了这部400页的小说。主人公和其他作品中的登场人物，背景都早已长时间地生活在我脑子里了。写起来后，那些人物便清晰地跃然纸上，他们简直像活着的人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又哭又笑，一会儿分别一会儿相见一会儿又开始讨论。我脑子里听得到他们的笑声，耳语，还能倾听会话。完全不需要为写小说而进行思考。脑子里人物的各种心理活动，会话，我只要握着笔去追着就好。偶尔也会有笔跟不上的时候。累了就在桌子前囫圇个儿地睡一觉，饿了就吃用米饭和鸡蛋煮的杂烩粥，有时候会喝点儿煮咖啡，总之是以一种忘我的状态完成了一本小说。
（《白三叶》50-51页，1941年2月记）

出现在作品中的赵中瑛（铃木著作中通常叫做“赵君瑛”这个假名字）和留日学生们在作者头脑中自由地行动说话。“我只是追跑在他们她们身后听着语言，把那些记下来就可以”。

赵中瑛的父亲民国17年8月（1928年8月）在九江的共产党势力引发的暴动中被杀害。父亲名叫方若淵，母亲赵氏，父亲任九江县的县知事。赵中瑛的姐姐也与父亲一同被杀。根据日本人田中忠夫所著的《中国农村革命的实证研究》记载，方氏是国民革命中的老革命，深得农民和工人的信赖。赵中瑛在父亡后，母亲到汉阳的教会学校任教，她一人受到在南昌有住所的，父亲同僚兼好友的张氏一家的照顾。妹妹过继给了在杭州的亲戚。母亲后来一人住在汉阳，靠任教的工资给在南昌女子中学上学的赵中瑛邮寄学费和生活费。

赵中瑛1934年写日记当时，是南昌女子中学高等部（现在日本的高中生）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和体育都很优秀，成绩出类拔萃，容貌端庄，擅长跳远，50米跑，100米跑这些陆上竞技项目，拥有代表江西省

参赛的实力，据说曾上过南昌某报纸被称为“南昌女子中学之花”。还非常喜欢读书，最喜欢丁玲的作品，也读过矛盾的小说。不论什么都要争第一，是那样一个强势又可愛的少女。她受到张，谢两家人的宠爱，与张佩芳同年级也是最亲密的好朋友。赵中瑛将1934年1月至7月间生活中发生的日常小事，同学间的交往和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南昌文化学会等活动时的情景一一详细地记在黑布封面的日记本中。

读这本日记让铃木非常感动。丰富的文章表现力，并深深为她的才气焕发，明朗豁达的性格所着迷。她母女二人没有念大学的钱，也没有能资助她的亲戚。尽管如此，她还是精神饱满地学习和运动，憧憬着通过江西省的奖学金考试像张家，谢家人那样去日本留学。但是，日军正一步一步地入侵中国。这样的時候，留学日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为此她十分烦恼。铃木被这个生存在祖国命运和个人利益的夹缝中，独自孤独斗争着的可爱少女深深打动。似乎可以说铃木已经十分羡慕她了。

铃木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将这本日记和书简译成日文，由此在他脑海里出现这样一种强烈想法：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敌对国的人，是有着同样命运，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感情的人。在铃木的脑海里，他们她们自然地随意地说着，笑着，哭着，呼喊，开始恋情。他自己也面临着在战争中随时死去的命运。这样一想，铃木无疑是体会到自己与张定钊，谢光远，赵中瑛，张佩芬，张佩芳等同样，是活在战争这个悲剧时代却仍要艰苦奋斗的人。

如果不是那样，不知道哪一天或许就死在战场上，快三十岁的铃木就不会在战争正酣时，并且是对英法宣布宣战情势已发展成世界战争的昭和16年至18年这样一个时间里出版四册著作，将自己的战争经历和中国留学生们的苦恼，苦斗如此一丝不苟地并充满深切同情，共悲喜地进行书写，刻画。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对言论进行管制，对纸的管制也很严格，那是一个出版情况十分糟糕的年代。但他还是倾尽全力以中国青年的日记和书简为基础创作出版了《蚬花》和《远东的人》（三部曲），即使这样那种执念与努力仍还让人难以理解吧。

此外，铃木从高中时代便师从歌人北原白秋创作和歌，大学时代还加入戏剧活动组登台演出，特别喜欢听贝多芬的作品，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战地上海，他常会去内山书店或者转转唱片店，怀揣买来的书和唱片上战场。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学，音乐知识与才能也是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吧。高中时代便失去母亲并在中国战场收到父亲过世电报的铃木，对父亲和姐姐同时被杀，与母亲和妹妹被迫分离独自一人生活的赵中瑛充满同情也被她所吸引。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可爱聪明的少女呢？如果读一下《与日记本最后的分别》的问候便可以得以一窥。铃木为此深受感动，把最后这部分的日文和中文原文添加于此。

赵中瑛日记本的最后一日，1934年7月12日（星期四）日记

我亲爱的朋友啊。（朋友指的是“日记本”）无声的灵魂的知己啊。我即将与你分别。让我最后再写一点儿道别的话吧。朋友啊，遗憾的是快到临别的时刻我却无法将自己的思绪化成文字。我在你纯白的身体上残酷地刻下许多伤痕。那之中有无法明说隐藏心底于秘密的隐语，也有悲伤的泪痕，疯了一样开心的欢笑，爱的流露，毫无保留地把这些知心话都向你道来。朋友啊，天地之间真正宝贵的唯有“真”。让我欣慰的是你的身体全部是用这“真”组成。朋友啊！高贵的我灵魂的知己啊！愿这杯离别的酒，能慰藉短暂的“此刻”。“Children speak the Truth（孩子才说真话）”

中文／原文

呵，親愛的友人，無聲談話的靈的知己。我們要暫別了。這裡我要對你說幾句告別的話。朋友，對不起你，愧我談了連將要離別時的心情，我都不能用文字表達出來。在你純白的玉體上，被我無慘的刻画了無數的創痕。這創痕裡表現著各種情素，有難言的隱語，有悲楚敵淚痕，有狂的歡笑，有真情的洗露。總之我是毫顧及敵把一切都坦坦白的向你述說了。朋友，天地間真可寶貴的是「真」。而你

的本身就是「真」的組成。那麼一切，我滿足了。朋友！ 高貴的靈的知己呵。暫時讓我們來狂歡的飲這別離之酒！ “Children speak the Truth”

3 赵中瑛及张，谢两家人的悲剧性命运

赵中瑛 1934 年因参加田径比赛去武汉时参观了武汉大学。要是能来这么好的大学求学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可是母亲有限的工资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她只好考虑参加江西省的公费留学生考试，去许多朋友就读的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

铃木在《赵君瑛日记》（1941 年刊）中让她说了这样的话。“去日本吧。这并不是对国家感情上的背叛。我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日本。绝不是为了成为日本人而去。她对长时间让自己痛苦的这个矛盾因为此番领悟而豁然开朗。……她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直到她这个真切的愿望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打碎为止”（183-184 页）因日军战火扩大受此影响废止了去日本的省公费留学制度，她唯一的希望就这样被击碎。

1934 年 3 月赵中瑛问回故乡南昌的谢光蕓，张佩芬夫妇：“日本有意思吗？”张佩芬回复道：“嗯，有意思哦。不过，怎么说好呢，日本人对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对住在邻国的中国女学生怎样生活好像根本无法想像似的。”“我去的话能学习吗”“当然啦。不论怎么辛苦，只要抱着一个目的就能坚持。日本女孩子都很小孩子。中国人比较大一些”“现今的中国还很年轻，又加之处于民族危亡的时刻。因此，不论是谁比起自己的事来首先要想的是国家之事……”

从姐姐张佩芬那儿听到奈良的日本同学对战争和中国的事不太关心，张家最小的弟弟老端说：“我们早晚要教训他们。对方这种心不在焉的态度刚好”。这个最小的弟弟张定端还只有 17 岁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铃木让作为彻底的反日主意者的他说了下面的话：“快点长大早就想教训日本了。只有教训了日本，他们的国家才会安泰，他们的民族才会昂首阔步与世界文明国家为伍。不教训日本，他们的国家就会灭亡，他们的民族始终都会走向悲惨的命运”（166-169 页）

赵中瑛日记（《赵君瑛日记》1963 年版，4 月 2 日日记）中记载了如下内容。

（这一天，赵中瑛，张老端，谢光蕓·张佩芬夫妇聚在一起聊天）知道贤兄（亲家兄谢光通）不是汉奸而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我和老端都安心下来。老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贤兄反对与日本战争”，好像老端就把贤兄当成了汉奸。汉奸会被杀，那样莲姐（张佩芳）一定伤心吧。老端爱着莲姐所以也一定会很悲伤吧。

可是，决然地说要“三日之内把上海的日军全部赶到海里”，“我们中国军可以在三日之内把上海的日本人剿灭”的老端 8 月在上海上空的空中激战中击毁飞机，靠降落伞逃脱后却在降临地面时被斩。20 岁初战便战死（这是事实？ 这个细节描写出自小说《陈氏一族的书信》（1942 年版）。日本报纸中没有刊载“真实姓名”）。

谢光蕓·张佩芬夫妇的命运更具悲剧性。谢光蕓五卅惨案时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个学生运动的斗士。同在复旦大学的弟弟谢光贤却在游行时被巡警队枪击身亡。谢光通的长兄谢光远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系冶金专业，1927 年受病榻之父命归国在南昌工业学校当任教，也未能挽回家族日渐衰退的命运。基于此谢光通决心像兄长那样赴日留学，立志做医生并照顾弟妹们。他留学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战败后与现在的京都大学合并），1932 年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苦心钻研医学十年后于 1934 年 3 月毕业，正式获取日本医师资格。这期间，日军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于 1931 年宣布建立“满洲国”。当时，许多留学生抗议并掀起抗日回国运动，他也于 1932 年暂时回到天津避难。

谢光蕓 1930 年与张佩芬结婚，后将妻子佩芬从南昌招至日本并升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理科。这一年入

学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的中国女学生共 9 名，其中 5 名来自江西省。1934 年 3 月光藻与妻子一起带着在京都出生的“京儿”暂时回到南昌，在亡父墓前告父学业已完成。夫妇二人在归乡时见到了前面所写的赵中瑛和最小的弟弟张老端。

后来谢光藻把妻子的妹妹张佩芳也叫到日本来 1935 年 3 月升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可是发生什么样的不幸呢？佩芳 1937 年 7 月即卢沟桥事变爆发那日，因粟米结核引发脑膜炎在京都的医院医治不到一个月便在医院去世。佩芳和佩芳的未婚夫罗君仁（就职于汪兆铭政府，是后被看作“汉奸”的罗君强的弟弟）来京都将遗骨带回国（上述内容出自小说《陈氏一族的书信》1942 年版第 22，23 节。但是张佩芳来日本入学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并在不久后生病死于京都一事据说是铃木的创作）。

1939 年夏，作为中尉军医滞留南昌的铃木英夫在日军开设的位于南昌市内的卫生所勤務。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与日本女性结婚的蔡姓中国青年。铃木还四处打听谢光藻，张佩芬，赵中瑛等人的消息。那位蔡姓青年从熟悉留日学生信息的人那儿打听到“谢已经病死”的消息。在日本学过医的青年在日军进攻南昌之前到市内的救护所热心救护难民和负伤人员。却听说他突发 40 度高烧，经常照顾他的年轻女性将他带到唯一开着的一所法国医院救治，最终还是在南昌沦陷前死去。（《赵君瑛日记》1963 年版。这个结局好像是铃木的创作）。

谢家次子谢光藻（书中用名是周守贤）曾就读于九州户畑市的明治专门学校（昭和 6 年左右即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与张佩芬一起回国曾滞留于天津的叔父家。后升入大阪帝国大学工学系（酿造学科），与张佩芬结婚得获麟儿“京儿”。1937 年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就读的妻妹张佩芳在京都的医院因急性脑膜炎死去这一内容又会让人信以为真。至于谢光藻的归国时间并不十分明了，可能是 1937 年当年吧。（下面的内容是铃木英夫小说中的内容——有关归国回到南昌后谢光藻的最后结局。铃木在南昌驻军时从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日军宣抚班成员的龚姓人处听到了较为切实的消息。据龚所讲，他于 1939 年春日军进攻南昌前在市内的医院死去。《赵君瑛日记》1938 年版第 248-251 页，在《某中尉的手记》的 183-194 页中写的不是来自龚姓而是万姓的听闻）。

从最近获取的信息来看，谢光藻在战争中活下来，1949 年任天津市首届各界代表，1951 年任天津市商工会代表，1963 年任第 3 届河北人代代表并于同年升任塘沽区副区长。

铃木根据蔡姓人的话判断“病因可能是义膜性喉炎”，作为医生的谢光藻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没得救了，另外认为最后护理光藻的年轻女性应该是赵中瑛（《某中尉的手记》187-191 页）。

卢沟桥事变后带着孩子抱着妹妹遗骨回到故乡的张佩芬又怎么样了？之后与同回国的丈夫度过短暂的家庭生活时光，在日军侵略南昌市内之前出门避难。丈夫和赵中瑛则留在南昌。隆冬时节佩芬带着双亲，嫂子，京儿等家人艰辛地乘船去投靠吉安友人。可是要投靠的那位医生友人却已关闭医院到什么地方去避难了。之后张佩芬一行过着四处流浪绝望的日子，又从吉安返回临江再辗转至桂林。在途中各处给留在南昌的谢光藻和赵中瑛寄去好多信都没有回音。张佩芬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寄自桂林市内，内容见下。日期 1939 年（民国 28）1 月 15 日。这是铃木英夫从南昌张家带回的张氏一族的最后一封信。收信人是留在南昌的赵中瑛。张佩芬 1938 年 10 月离开南昌避难后至 1939 年 1 月共给赵中瑛寄过六封信。这最后一封信寄自桂林。

亲爱的瑛妹！一直没有你的回信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之前寄给你的信没有收到吗？还是南昌发生巨大之变化？近来有关故乡音信全无，报纸上也没有报道。父母也十分担心。离开南昌已有三个多月。这样寂寞与痛苦的日子，我已经不堪忍受。现在想来不管是何种苦难，我留在南昌就好了。痛苦日夜侵蚀着我的身体，精神早已疲惫不堪，每晚都会做噩梦。避难的人群使得市内十分混乱，虽然常去见老友，但是这里于我而言依旧如同旷野。如果不是因为京儿，我怎会抛下丈夫来到这样的地

方呢。看到路上行人天真的笑脸，这些人是如何战胜心中的苦闷的呢，我不由得羡慕起他们来。

这段时间经常会想念佩芳妹妹。那是还没到奈良留学时候的佩芳，和谢光贤三个人一起爬谢家后院的石榴树，掏寺庙里梧桐树上的喜鹊窝。那时候好开心，那样平和的日子我也曾经拥有过。想到这些就觉得此刻在这里的我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瑛妹，所谓活究竟为何？ 悲伤也好痛苦也好，时间长了总有一天会变成让人怀念的回忆。可是，此时此刻我饱受风霜般痛苦的心何时才会让这些成为回忆？ 那样的日子又何时才会到来？ 中国现今在举国战争，那么多的人在为国捐躯。我这样的心情会让人觉得很奢侈吧。恐怕连你也会那样说吧。可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痛苦消失的时刻或许是我生命逝去的时候吧。瑛妹！只盼你能明白我这样的心境。随着冬天的到来，现在住的房子已经冷得让人受不了了，打算搬到正阳街那边去。希望我们再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佩芬（于桂林，1939年1月15日）

4 自然科学家张定钊的另一种命运

张定钊是张家次子，是佩芬，佩芳，定端的哥哥。定钊之上有长子张凤举，凤举是最先来日本留学的人。日本的大正时代他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还曾留学法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可是，仅限铃木看到的这一家的书简来看，几乎没看到凤举作为张家长子照顾双亲和弟妹的线索。最关心父母和弟妹并不断向家里写信鼓励的是次子张定钊。凤举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定钊生于1903年，来日本后进入旧制一高（战后与东京大学合并）学习，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科，1924年毕业）。归国后进入由蔡元培创办的，以北京大学家属子弟为主的北京孔德学院任教。1926年再次来到日本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化学专业研究生院。他的研究方向是“测量矿物结晶的光谱确定其成分元素”。他给在南昌的父母寄过很多信。从那些信中摘录两封可以知道他生活与研究情况的书信。

父母亲大人

- （前略）研究所一事（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就职），外部方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请对外保守秘密。儿的研究不应被一时的政治，外交所累而是中国百年之际最基础，最根本的学问，暂时要排除一切杂音专心致力于研究（1931年4月20日）。
- （前略）听回国的友人说，从我国的学术界，教育界的现状来看，获得职位不是件易事，现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员这个职位是相当难获得的。三舅舅也赞成，说纵观国内各机关来看这是受政治影响最少的理想位置。即使现在国家想让学者发挥作用也没有进步到能够自由研究的程度。儿想远离政治专心研究，盼父亲亦能给予充分理解。随信寄去50元钱（1931年6月25日）
- （前略）儿民国13年从京都大学毕业后本想再经数年完成研究，但最终遵从父母亲之恳切要求遂赴北京谋职。当时在北京极力积攒下来的金钱亦都悉数寄给家中。之后，因在北京学问方面前途全无希望，又加之经济上没有更大的期望，恰逢在东京可获得庚子赔款补助（“义和团事件赔款”基金）的良机遂前往日本。此后，张佩然，张佩芳的教育费用及生活费等全由儿所负担。……希望父母亲能够知道我没有忘记家庭的心。……父亲一生从不吃奢侈之食，不穿华美之服，不浪费金钱，只是期望过上不饥不寒内心踏实的日子。遭遇现在这样的苦难真是没道理的事。（1932年5月30日）注解：上文中的

（ ）内的内容由小林备注。

张定钊在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成为国立台湾大学化学教授，1948年回国任职于前身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物理化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因该研究所迁到长春遂搬至此，1955年所属于“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他的研究业绩根据著作，论文可以追溯到1958年之后不详。张，谢

两家的留学生中，本着对学问的执著追求用踏实的努力来实现朴素的“稀少矿物研究”这样基础性，正如他所说是关乎“中国的国家百年大计”的研究，这在留学生当中是非常稀少的例子。（上述有关化学家张定钊的业绩出自日本的八耳俊文教授关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两篇论文）。

5 铃木战后依旧关心赵中瑛，谢光蕓，张佩芬等留学生

铃木回到日本后踏访奈良，京都向相关人士打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的中国留学生们的足迹，还走访获得在京都病死的张佩芳最后的情况。找到中国留学生听其诉说苦衷写下如前所述的四本著作。这期间铃木的双亲已经过世，父亲 1938 年 7 月死于脑梗塞。铃木接到“父死”的电报正是所属部队第 101 师团为攻略汉口从上海到南京的时候，因此电报是在南京接到的。铃木归国时便已没有双亲，他也因此可以全力以赴地致力于著作出版。铃木在 1942 年出版的《陈氏一族的书信》中让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的女学生们说了下面的话。在中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借留日中国女学生之口年轻的中尉军医写下面的“会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我中国人，不论发生何事除了中国便没有自己爱的国家了”，“中国的缺点，即使不说也清楚的。不需要日本人来说。日本人越是褒扬日本越是让人愤怒。日本，不过是这样一个小小岛国，人那么多一味地模仿欧美……”。“在日本所受之教育并不只是对欧美的模仿。我们是通过日本来学习欧美文化。并不是因为日本近而方便才来日本的”等等

日本战败后，铃木在静冈的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故乡神奈川县座间市开设了私人医院。另一方面还作为歌人北原白秋的高徒开展活动出版了多部歌集，随笔，白秋研究等著作。又于 1963 年出版《赵君瑛日记》（本名赵中瑛），将从南昌张家带回的日记，书简全部翻译成日文并出版。1966 年 1 月 29 日在电视节目《证言 2·我的昭和史·2》中以《中国的安妮日记》为题接受三国一郎的采访述说了有关南昌之战和对张，谢两家留学生以及《赵君瑛日记》的回忆。

1980 年到访北京时，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采访到了与张佩芳（这是本名。小说中的假名字是“陈玉兰”）一起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上学的张京先（这是本名，小说中的名字是“杨文华”）并与其进行了畅谈。张京先愉快地说到在女子高等师范上学的时候在音乐会上演奏自己擅长的钢琴。那时铃木好像打听到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习中国留学生们的去向但是文革到来后就不知道大家的行踪了。张京先回国后与留学于庆应大学的陈濤（因编集《日汉辞典》还有十一余万字的《现代日汉大辞典》而著名）结婚。两人都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

铃木又于 1994 年 3 月邀请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生在内的 10 多名“中日留学生会议”的成员到座间市自己家中并谈到战争时期的事。1995 年将在中国战场上写的日记以《战场秘帖》为题出版。这个日记中记录着日军对俘虏的简单处刑，日本士兵的众多阵亡者，负伤者人数和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也记录了在上海战场俘获的三名中国士兵被问到“处死还是投降？”劝降后随即遭到斩首。在《某中尉的手记》中有攻略南昌时抓到两名年轻女兵的相关笔记“日本兵那儿得知实情。她们希望不受辱地死去”并上报总部，还记录说她们怕是被处以极刑了吧。《战场秘帖》是写于前线的日记，还是叙述自己在中国战场的经历与战争实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却被推迟到战后的第五十个年头即 1995 年，想必是历经多重苦恼之后的决断吧。

在中国战场上见闻到的中国人的悲惨命运是他生涯中“扎在胸口上的一根刺”。另一方面作为医生在山西省的山里目睹日本兵被击中头部患上重病“……嘻嘻的傻笑和狂笑‘既已如此’下决心，一个接一个地注射吗啡，不结束，不死，我回不去，不可告知的心中之痛，孩子知道吗……”咏着长歌，只是对女儿们说“差一点儿被蝎子咬到，还活着，就只是爸爸知道啊”。这一经历可以说是贯穿他生涯内心巨大的伤

痕。这个长歌刊载在冈村俊彦著的《篝火》（文献者，1961年）一书中，后又收入铃木的随笔集《紫葳》（柊书房，2000年）。

他回国时将自己的日记和中国人相关资料带回一事是违反军规的行为。但是铃木又大胆地利用将校军医这一地位将这些藏在行李下面带回日本。中尉军医作为个人因为医生的专业性受到尊敬，但实际在军队内部的指挥命令系统中是没有权力的。铃木将自己的日记偷偷带回并写作《赵君瑛日记》时是受到很大自主限制的。铃木还写到曾将寄给远在日本的家人和挚友的信特意带到上海市内投到民间邮筒。

中国战场的经历是后来贯穿铃木人生的主题。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1920年代，30年代与铃木同时代留学日本并付出极大牺牲，就学于日本最高学府的中国人，对于他们之后的人生不应无所关心。谢光藻在写给双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前略）日本人作为个人是善良的，但在国家层面没有对我们留学生做任何考虑。留学生归国在自己国家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全然不知。与此相反欧美各国为每个留学生回国后能够获得有利地位竭力进行帮助……”（《赵君瑛日记》1963年版，第196页，1934年2月20日“双亲收”的书简）。这个问题依然是日本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结束本文时，与2010年故去的铃木一起想问下面的事情。铃木离开南昌后，日军的侵略战争又持续了五年时间。他们她们一定是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的日子。特别想知道逃出南昌后的张佩芬和她的父母以及谢家人之后的命运。想必已成为故人的铃木也一定想这样问吧。

张佩芬和她的父母，孩子京儿漂泊到桂林之后的命运如何呢？

还有充满才气的少女赵中瑛在战争中生存下来了吗？那之后有了怎样的生活？她的人生是发挥才情充满意义的人生吗？

赵中瑛的挚友，同学张佩芳来日本留学并客死京都一事，铃木小说里说的是事实吗？

谢光藻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后成为医生，但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回国一事是真的吗？他实际上度过了怎样的人生？

铃木在战时南昌听万氏说“谢光藻在江西省为战争难民治疗时病死”一事是真的还是创作呢？

张定钊1950年代以后也一直持续从事自己的研究了吗？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呢？张定钊的妻子龚绿子在日本学习的美术之路一直持续下去了吗？这两家的子孙现在身处何处？等等，想知道有关张，谢两家的全部情况。

最后以铃木在战争时所作的四首和歌来做结尾。

- 在画着有刘海儿少女的墙壁下，沮丧不已辗转反侧（于上海郊外，1937年秋）
- 中国孩子的目光充满渴求，央求着要我买鸭蛋（于汉口，1938年夏）
- 我的战友命损赴死，越过草丘忽降时雨（于修水，1938年冬）
- 沉浸在昏暗的街区，筋疲力尽睡于路旁（于南昌，1939年春）

后记

写完上述内容后又获得一些相关书籍和信息。比如，“第101师团·卫生队”中作为军医铃木英夫部下的冈村俊彦（医生）在战争时所写的翔实的日记以《篝火》为题（1961年，文献野社）获得出版。促成此出版的铃木在该书的开头写下《红叶般的秋草——写给〈篝火〉》一文。铃木的战场日记《战场秘帖》，冈村俊彦的《篝火》都没有对战时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因为日本兵的“放火，杀人，强奸，掠夺，抓壮丁”的实际情况进行记录。站在将校军医的立场又加上医疗部队的特殊性，还因为把自己秘密写下来的细

致的日记带回日本对军规的违反等等，实际上大多数士兵都不得不进行自主限制。当然将涉及到自己国家军队的虐待行为翔实地记录下来的将校恐怕在哪个国家都不存在吧。但在《篝火》一书中可以窥视到很多这样的记载。

另外，与铃木同属“第101师团”卫生队的牙医之女加藤克子女士在父亲去世后多次访问父亲曾经参加战斗的庐山，修水县，写下《日中战争中悲哀的军队——搜寻父亲记忆的旅行——》（瓦书房新社，2002年刊行），《生活于父亲们“战场”的人们——连接日中“记忆”之旅》（第三书馆，2011年）两部著作并出版。前一本书已译成中文名为《日中战争中悲哀的军队——搜寻父亲记忆的旅行——》介绍到中国。进入2000年之后，加藤克子访问父亲的参战遗迹并展开对日军实际行为的调查活动，去中国寻访当时战争激烈的庐山周边及修水县的人们。在当地听取人们诉说日军入侵时的证词，记录日军当时“放火，杀人，强奸，掠夺，抓壮丁”的实际情况。加藤调查所获得的证词可信性十分高。不是大学里做中国史研究的加藤却能独力挑战如此重大问题，与当地人们亲切交流并取得如此丰盛的成果，对此谨表达深深的敬意。

让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搞中国历史研究的研究者感到“没有颜面”。向加藤克子表达崇高的敬意。顺便要说的是为加藤的调查旅行提供各种方便的久保田博子女士（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是本人小林的老朋友。

通过上述书籍将“铃木英夫——冈村俊彦——加藤克子——南昌的张家，谢家人——廖梅老师——中国人的战祸实录”用这样一条线串联起来，在此致以深深的感谢。

再说几句题外话，加藤克子女士于2002年即在铃木先生生前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听过一些战争时候的事。可是第二次要拜访时却“从担心父亲健康的女儿那里寄来谢绝下次访问的明信片”因此未能再实现。

我（小林一美）拜托中国和日本朋友们一直在寻找本文中记述的南昌张家，谢家后裔的情况。中国的廖梅老师，日本的八耳俊文，野村鲇子等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今年春天以后对南昌张家，谢家的调查获得很大进展，张家和谢家后裔的情况已逐渐弄清楚，期待一两年之内能弄清全部情况。

终